

建构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

对中国“未富先老”判断的新考察

林 宝

【内容摘要】在系统回顾“未富先老”判断产生以来的各种争论以及总结“未富先老”的不同内涵和判断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为直观的判断标准——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发展水平一致性指数。以此标准可以把世界各国(地区)分为 3 种类型:未富先老、老富基本协同、富先于老。基于《世界人口展望 2022》和《人类发展报告 2021/2022》中的相关数据对 1990 年以来中国“老”与“富”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在 1990 年代就一直处于“未富先老”状态,但近年来这种状况正在改善。以人均国民收入代表“富”来分析中国“老”与“富”的关系能够发现,中国刚刚走出“未富先老”状态,进入“老富基本协同”状态;以人类发展指数代表“富”来分析中国“老”与“富”的关系则发现,中国正处于从“未富先老”状态向“老富基本协同”状态过渡的临界点。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发展水平;未富先老;老富基本协同;一致性指数

【作者简介】林宝,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006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in China: A Re-examination

Lin Bao

Abstract: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various debates on the judgment of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and puts forward a more intuitive criterion: the index of consistency between population ageing and development level. According to this criterion, all countries and reg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basic coordination between being “old” and being “rich”, and getting rich before getting old. Based on the data of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and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2022, we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ng “old” and being “rich” in China since 1990 and find that China has been in the state of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since 1990, but this situation has been changing in recent years. Using per capita national income as a representation of being “rich” shows that China is moving out of the state of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and entering the state of basic coordination between being “old” and being “rich”. Using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s a representation of being “rich” indicates that China is at the point of transition between the two states.

Keywords: Population Ageing, Development Level,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Basic Coordination between being “Old” and being “Rich”, Index of Consistency

Author: Lin Bao is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Research Center on Population Age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mail: linbao@cass.org.cn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2021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必须准确把握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长期以来,学者们已经从多个方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进行了总结(邬沧萍,1999;林宝,2021)。概括起来,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特征的描述一般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从人口自身特点出发,总结出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口规模大、高龄化趋势明显、城乡差异大、地区差异大等特征;另一个则是从人口老龄化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出发,总结出“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等特征。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众多特征之中,对“老”与“富”关系的概括是关注度最高的议题之一。其中,最常见的概括是“未富先老”,这一表述从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出发,阐述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背景,言简意赅,朗朗上口,易于传播,因此在学术文献和官方报告中均有广泛应用。但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动态过程,特别是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显著提高,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现阶段是否仍然可以将中国“老”与“富”的关系概括为“未富先老”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关于“未富先老”的争论及其焦点问题;然后对“未富先老”中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辨析;接着构建了一个新指标以及相应的判断标准,并运用《世界人口展望 2022》(United Nations, 2022)和《人类发展报告 2021/2022》(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22)中的相关数据分析中国“老”与“富”关系的历史演变及现状;最后讨论了“未富先老”这一判断以及“老”“富”关系变化的时代意义。

1 关于中国“未富先老”的争论

关于中国“未富先老”的判断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据学者们(杜鹏、杨慧,2006;顾严,2019)考证,最早是邬沧萍先生在 1986 年出版的《漫谈人口老化》一书中提出了这一判断的雏形,并于 80 年代末在讲话中率先使用了“未富先老”的表述。根据邬沧萍先生对“未富先老”判断提出初衷的回忆,“未富先老”是在 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发布后提出的命题,旨在提醒全社会,面对中国生育率快速下降、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发展趋势,必须做好思想、理论、舆论准备,物质准备,制度准备,人才准备和健康准备等,居安思危,有备才能无患(邬沧萍,2008)。邬沧萍等(2007)希望这一命题的提出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中国经济还不发达”与“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这一对矛盾所带来的复杂问题。由是观之,“未富先老”命题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警示在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发生的人口老龄化将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需要做好应对这一局面的各项准备。

“未富先老”判断提出之后,一直存在一些争议。一类争议探讨的是“老”与“富”之间的根本关系,即人口老龄化到底对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这实际上涉及“未富先老”这一判断的提出是否有必要。与“未富先老”判断所表达的担心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会带来挑战不同,马瀛通(1987)认为人口老龄化是好事不是坏事,他主张加速人口老龄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随后,乔晓春(1988)专门撰文批驳了马瀛通(1987)的观点,认为该文以老年人口数量代替人口老龄化系数,混淆了人口老龄化的概念,人口老龄化并不能直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邬沧萍、徐勤(1990)认为主张“要加速人口老龄化”是倒果为因,是一种误解。在 20

年后的另一篇文章中,马瀛通(2007)延续了此前文章的观点,认为“未富先老”是中国计划生育成效的体现,是为了缓解人口压力,减轻人口因素对经济的制约,“先老”是促“快富”的标志,他还提出,人口问题实质是一个发展问题,中国是“为富先老”。王丰(2007)则针对此观点提出,尽管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发展起了加速作用,但是将生育率下降所导致的经济收益作为“为富先老”的依据,是牵强附会的。

另一类争议探讨的是“未富先老”是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一个特征事实,这主要是涉及“未富先老”这一判断是否成立。《人口研究》编辑部曾于2006年和2007年专门就此组织过两次论坛。在第一次讨论中,李建民(2006)从区分老年型人口和老龄社会的概念出发,认为中国还不能称之为“老”,并且发现与发达国家进入老年型人口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中国要更富,进而认为中国是不是“未富先老”还只是一个“悬疑”,并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是“即富即老”;杜鹏、杨慧(2006)则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因此“已老”,且多指标多参照均表明中国“未富”,同时认为到2010年左右中国将进入“又富又老”阶段,告别“未富先老”阶段。在第二次讨论中,李建民(2007)更加明确地提出“未富先老”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当前的老年人问题与“未富先老”无关,真正的问题是“未备先老”;邬沧萍等(2007)则认为“老”和“富”都有多重含义,从20世纪80年代直到今天,“未富先老”或者说“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坚持“未富先老”命题,利大于弊。除了这两次论坛,李建民在另一篇合作文章(姚从容、李建民,2008)中继续论证了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该文认为与世界其他老年人口比例相当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差;与世界其他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并不是最严重,因而仍然认为“未富先老”并非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本质特征。莫龙(2009)通过构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数,运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多个来源的数据分析表明,198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一直显著超前于经济发展,也就是说,“未富先老”现象将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存在。顾严(2019)借助老年人口比重、人均GDP、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数3个指标将“老”与“富”的关系分为7种类型,并认为中国在21世纪初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同时也进入了“未富先老”状态,但很快又转变为“边富边老”,这一状态将贯穿“十三五”时期,进入“十四五”时期后可能会重返“未富先老”状态。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未富先老”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未富先老”的概念,即如何理解“老”“富”以及“未富先老”;二是关于“未富先老”的判断标准,即如何判断是不是“未富先老”状态。本文将针对这两个方面分别加以讨论。

2 “未富先老”的含义

从现有文献对“未富先老”这一概念的界定和使用来看,学者们对“老”“富”以及“未富先老”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也是导致学者们对中国是不是“未富先老”的判断存在分歧的根本原因之一。本文首先从“未富先老”这一判断的提出者——邬沧萍先生对“老”“富”以及“未富先老”这些概念的界定出发,进而分析现有文献中学者们对这些概念的使用情况,并提出本文对这些概念的基本认识。

根据邬沧萍等(2007)的总结,“未富先老”中的“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口老龄化;二是指进入老年型人口。杜鹏、杨慧(2006)的研究中使用的“老”是指进入老年型人口;李建民

(2006)的研究中使用的“老”则是指“老龄社会”,并认为进入老年型人口并不意味着进入老龄社会;莫龙(2009)、顾严(2019)的研究实际上是从人口老龄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因此,概括起来,学者们在“未富先老”语境下所提及的“老”主要包含人口老龄化、进入老年型人口和进入老龄社会三层含义。但由于目前学术界基本上还是普遍把进入老年型人口看作是进入老龄(化)社会,所以后两层含义在大多数研究中是一致的。

邬沧萍等(2007)还概括了“富”的三重含义:一是指收入和财产(或财富),代表性指标是人均GDP;二是指丰富和富裕,即考察一国养老物质资源的数量与老年人口需求相比是否充足;三是指发达程度高,不仅包括经济、物质资源等“硬件”方面,还强调社会发展、文化环境、制度建设等“软件”方面。从现有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主要以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富”的状况。例如,杜鹏、杨慧(2006)主要使用人均GN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产业结构及城市化水平等来衡量中国“富”的状况;莫龙(2009)使用的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顾严(2019)使用人均GDP来衡量“富”的状况;李建民(2006、2007)和姚从容、李建民(2008)则更接近从发达程度的角度来讨论“富”,除了引入常用的经济指标以外,还引入人类发展指数或是其包含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预期寿命等指标,并更加强调制度准备的重要性。从养老物质资源的数量与老年人口需求相比是否充足的角度来讨论“富”的文献还较为少见,这可能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常规统计指标能够反映这两方面的状况。

正因为“老”和“富”均存在多种含义,所以对“未富先老”的理解或界定也存在多种角度,出现了不同的内涵。在邬沧萍先生本人的研究当中,对“老”与“富”关系的认识以及对“未富先老”内涵的界定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可以看出“未富先老”的三重含义:

第一重含义是指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发生人口老龄化。在邬沧萍先生早期的一些文献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未富先老”这一概念,但多次对“老”与“富”的关系有过明确的表述,其主要就体现了这一重含义。如《漫谈人口老化》中提到,人们认为人口老龄化是“富国的人口病”,而有人比喻中国是“穷国患了富国的人口病”(杜鹏、杨慧,2006),言下之意就是我们在不发达的情况下发生了人口老龄化。同期的其他文献则有更明确的表述,如我国人口老龄化发生在经济刚刚振兴的情况下(邬沧萍、曲海波,1986)、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背景下发生的(邬沧萍、徐勤,1990)。“未富先老”的判断是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发布后提出的,这是第一次能够从普查数据中明确看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从年轻化向老龄化的转变,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生期,基于这一背景,当时的学者从发生人口老龄化的角度去判断“老”与“富”的关系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逻辑。

第二重含义是指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年型人口。“进入老年型人口”是邬沧萍等(2007)总结的“老”的两层含义之一,由此便可推断出“未富先老”的这一重含义。实际上,在邬沧萍、孙鹃娟(2002)的文章中曾有这样的表述:“与此同时^①,随着我国人口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下降,在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就迎来了全球最独特的未富先老。”按照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0%的标准,2000年恰好就是中国进入老年型人口的年份,可见邬沧萍、孙鹃娟(2002)关于“未富先老”的判断是基于进入老年型人口而做出的。

^① 此处是指2000年。

第三重含义是指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邬沧萍、陈卫(1990)提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相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超前性;邬沧萍等(2004)提出,中国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邬沧萍等(2007)强调,“未富先老”或者说“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这些都是对这一重含义的明确表述。理论上,第一、第二重含义都可以包含在第三重含义之中。

从其他学者对“未富先老”的探讨来看,第一重含义已经很少有人使用。这可能是因为距离 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已经过去 40 多年,发生人口老龄化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且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发生人口老龄化,已经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第二重含义则是学者们普遍使用的一个重要含义。杜鹏、杨慧(2006)与李建民(2006)关于“未富先老”的讨论实际上正是基于这一重含义而展开,只不过李建民(2006)认为进入老年型人口并不等于进入老龄社会,从而使双方的判断标准出现差异,进而得出不同的结论。第三重含义也经常被学者们使用,莫龙(2009)主要是从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角度来分析“未富先老”;林宝(2014)是从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上的相对排序的角度来阐述“未富先老”。顾严(2019)则是综合了第二和第三重含义来判断中国是不是“未富先老”。

本文认为,“未富先老”的第一、第二重含义,即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发生人口老龄化、进入老年型人口,是一种静态判断,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事实,无需再做讨论。因此,后文中关于中国是否仍然处于“未富先老”状态的讨论,主要是基于“未富先老”的第三重含义。

3 中国还是“未富先老”吗?

3.1 “未富先老”的判断标准

要讨论“未富先老”判断是否仍然适用,首先需要明确判断的方法和标准,对此,顾严(2019)曾做了较全面的总结,提出共有 4 类判断思路和方法:一是看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 7%(进入老年型人口)时的人均 GDP 或人均 GNP 水平达到多高;二是看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 7%时人均 GDP 是否达到高收入门槛;三是构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数,根据指数值进行判断;四是综合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进行判断,实际上就是把第二种和第三种判断方法结合起来。

中国进入老年型人口是在 2000 年左右,这已经是历史事实。因此,判断那时是不是“未富先老”,只要看当时中国是否达到了“富”的状态即可。判断 2000 年中国是否“富”了,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采用上述第二种方法,即看当时中国是否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地区)的行列,这个答案是简单明了的,因而很容易得出中国当时是“未富先老”的判断。李建民(2006)采用上述第一种方法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质疑的声音,他将中国进入老年型人口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部分发达国家进入老年型人口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行比较,认为中国进入老年型人口时比一些发达国家进入老年型人口时“要富裕得多”。顾严(2019)认为这个角度的分析有 3 个方面的局限:一是价格折减和汇率折算方法会影响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二是一些进入老年型人口较早的国家的经济数据不可得;三是尽管有“老”的标准,但是没有“富”的标准。本文同样认为,从这个角度去判断中国是否“富”了并不合适,因为“富”的标准是动态变化的。即便经过严格折算非常准确地测量了经济发展水平,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时代也

有着不同的意义,其所代表的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也可能千差万别。简单来说,尽管 100 多年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 2000 年的中国,但这些国家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是真正的“富”。衡量某个国家在某一历史阶段是否“富”需要参考那个历史阶段“富”的标准。

如前文所述,本文关于“未富先老”判断是否仍然适用的讨论将主要基于其第三重含义,即人口老龄化进程是否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从这个角度进行判断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在通过回归模型拟合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判断。莫龙(2009)进行了这一方面的创新,他构建了一个“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指数”,其基本思路是基于经验数据构建一个各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与人均 GDP 之间的回归方程,然后将老年人口比重实际值与估计值进行比较,以二者之间的吻合程度来判断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性。顾严(2019)则从回归方程形式、变量处理、参数估计、判断标准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改进,但仍然是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判断。然而,这种判断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思路和方法存在一些局限:首先,这种方法不够直观;其次,这种方法严重依赖于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和解释能力,当方程本身的解释能力较弱时,协调指数的可信度会大幅下降;再次,这种方法计算的协调指数稳定性较差,从顾严(2019)的研究中将固定参数改为可变参数就可以看出,基于不同年代数据模拟得出的方程系数和拟合优度有较大变化,因此在对新阶段“老”与“富”的关系进行判断时,往往需要拟合新的方程。实际上,顾严(2019)在此种方法的基础上还结合了第二种方法即进入老年型人口时是否达到高收入门槛来进行判断,并把“老”与“富”的关系分为 7 种类型或状态。这种判断方法由于划分的类型或状态过多,各种类型或状态的稳定性较低、变化较快,同时过于复杂,因而不大适合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特征概括。

另一种思路是考察一国(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各国(地区)中的相对位置是否具有-致性。姚从容、李建民(2008)比较了与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相当的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尽管这项研究是从绝对水平的角度展开的,但已经有了考察二者相对位置的思路雏形。林宝(2014)曾使用联合国发布的 2010 年人类发展指数中各国(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GNI)代表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使用基于《世界人口展望 2012》公布的各国(地区)2010 年人口年龄结构数据计算出的老年人口比重代表其人口老龄化水平,将二者分别排序,然后在对二者排位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论述中国的“未富先老”特征。这种思路的优越性在于操作简便、比较直观且易于理解。本文对 1990~2020 年期间世界各国(地区)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和人均国民收入的绝对水平及相对排序进行了相关分析,如图 1 所示,相对排序的相关性始终高于绝对水平的相关性,也就是说,使用相对排序可能比使用绝对水平能更好地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既往以人口老龄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排序来判断“未富先老”的研究中,通常的表述都是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排序超过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序,当二者相差较大时,这种表述的确可以说明二者的不一致性。但是,中国近几十年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速度显著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经济发展水平在各国(地区)中排序的上升速度也超过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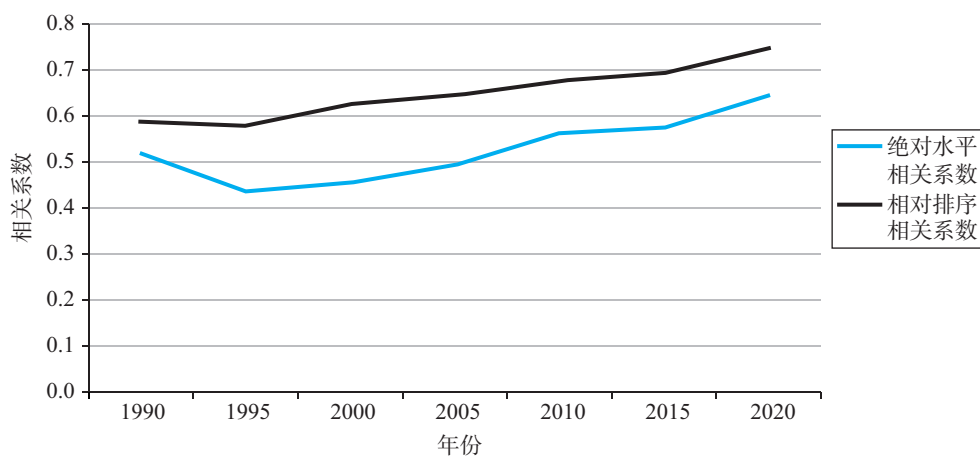
口老龄化水平排序的上升速度,二者逐渐接近。此时,就必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二者接近到何种程度时可以认为中国不再处于人口老龄化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即“未富先老”的阶段?一定要等到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序等于或超过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排序时才能算是摆脱“未富先老”的状态吗?如果是这样,由于二者完全相等的可能性较小^①,那么最终可能只有人口老龄化水平超前或是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两种状态,这未免过于简单,而且如果将排序差异很小的情况视作超前或滞后,似乎也不太合理。因此,本文尝试构建一个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排序的一致性指数,来判断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思路是,首先对各国(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后文我们会进一步借助人类发展指数拓展至发达程度)进行排序,然后计算二者差的绝对值,再与世界各国(地区)二者差的绝对值的均值进行比较,从而判断一国(地区)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是超前还是滞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抑或是二者基本协调。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I_{A,E} = \frac{|R_A - R_E|}{\overline{D_{A,E}}}$$

其中, $I_{A,E}$ 是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致性指数; R_A 是人口老龄化水平排序(从高到低), R_E 是经济发展水平排序(从高到低), $|R_A - R_E|$ 是人口老龄化水平排序与经济发展水平排序的差的绝对值; $\overline{D_{A,E}}$ 是二者差的绝对值的均值。

图 1 1990~2020 年世界各国(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Figur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e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1990-2020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人口展望 2022》和《人类发展报告 2021/2022》中相关数据计算绘制。后图资料来源同图 1。

注:本研究在计算相关系数时选择了 2021 年总人口超过 100 万人且大部分年份经济数据可得的国家(地区),7 个时点数据可得的国家(地区)数依次为 151、156、156、156、157、157 和 157 个。

^① 基于实际数据的计算结果显示,2021 年只有 2 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排序与经济发展水平排序完全一致。

当 $I_{A,E} \leq 1$ 时,表明一国(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排序与经济发展水平排序的差异小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二者一致性较好,可以认为该国(地区)处于“老富基本协同”的状态;当 $I_{A,E} > 1$ 时,表明一国(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排序与经济发展水平排序的一致性较差。再结合 $R_A - R_E$ 的符号进一步判断:当 $R_A - R_E$ 的符号为负时,表明人口老龄化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即处于“未富先老”状态;当 $R_A - R_E$ 的符号为正时,则表明人口老龄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我们姑且称之为“富先于老”。由此,我们可以将所有国家(地区)划分为 3 种基本类型:未富先老、老富基本协同、富先于老。

3.2 对中国“老”与“富”关系的判断

本文将从两个角度判断中国“老”与“富”的关系:一是人口老龄化水平是否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二是人口老龄化水平是否超前于综合发展水平,即发达程度。要进行这样的判断,需要人口老龄化水平和发展水平两方面的数据。对于人口老龄化水平,本文首先采用《世界人口展望 2022》中的各国(地区)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来衡量。同时,考虑到《世界人口展望 2022》中的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数据与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存在差异,本文还将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历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数据替换《世界人口展望 2022》中的相应数据进行计算。更进一步,为了检验关于“老”与“富”关系的判断的稳健性,本文还将以老年抚养比代表人口老龄化水平进行同样的计算。对于发展水平,本文采用《人类发展报告 2021/2022》中的各国(地区)人均国民收入代表其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类发展报告 2021/2022》中的各国(地区)人类发展指数代表其发达程度。由于人类发展指数是从 1990 年才开始推出的,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分析期限确定为 1990~2021 年。这一时期基本上也是中国提出“未富先老”命题以来的时期。

在数据处理上,本文剔除了 2021 年总人口不足 100 万人且缺乏相关数据的国家(地区),得到 157 个有 2021 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和人均国民收入数据的国家(地区)、156 个有 2021 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和人类发展指数数据的国家(地区)^①。但在早期,有少数国家(地区)存在人均国民收入和人类发展指数数据缺失的情况。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数据完整的国家(地区)在 1990~1994 年期间有 151 个,在 1995~2007 年期间有 156 个,在 2008 年以后有 157 个。1990~1994 年期间缺失人均国民收入数据的国家(地区)主要是前南斯拉夫地区国家,以后续数据判断,这些国家(地区)1990~1994 年期间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和人均国民收入排序基本都在中国之前,对中国两种排序的差的绝对值的影响很小。从人类发展指数来看,由于其在 1990~1999 年期间缺失数据较多,因而综合发展水平角度的分析从 2000 年开始。2000 年以后也有一些国家(地区)缺失人类发展指数数据,在 156 个国家(地区)中,2000~2004 年期间缺失数据的国家(地区)为 4~8 个,2005~2009 年期间为 1 个。但从这些缺失人类发展指数数据的国家(地区)后续有数据年份的排序来看,其主要是两种排序均在中国之后的欠发达国家(地区),因而其数据缺失对中国两种排序的差的绝对值几乎没有影响,对差的绝对值的均值和中位数的影响也较小。为了减小极端值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直接剔除一些极端值再计算均值,剔除的极端值有 6 个,主要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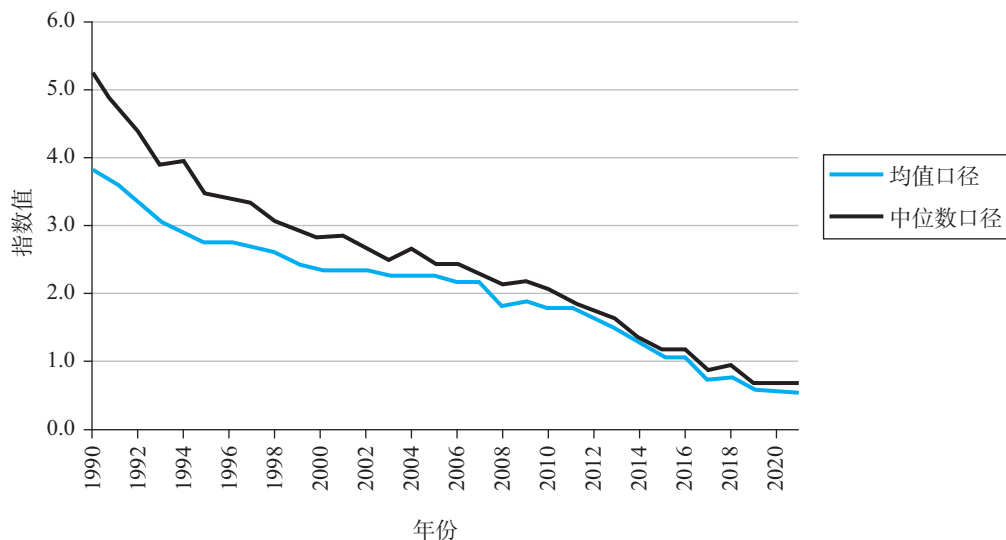
^① 《人类发展报告 2021/2022》中提供了索马里的人均国民收入数据,但未提供其人类发展指数数据。

海湾地区的那些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世界前列而人口老龄化水平极低的国家,剔除依据是两种排序的差的绝对值超过了国家(地区)数的 1/2;第二种方法是使用中位数代替均值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从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走出了“未富先老”状态。不同口径的数据均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而世界各国(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排序差的绝对值的均值和中位数则保持着相对稳定,因而中国的一致性指数持续下降,“老”与“富”的协同性逐渐增强。本文首先以《世界人口展望 2022》中的各国(地区)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作为人口老龄化水平的代表性指标,以《人类发展报告 2021/2022》中的各国(地区)人均国民收入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采用均值口径还是采用中位数口径计算,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性指数均处于快速下降之中,这表明中国“老”与“富”的关系处于不断改善之中。如图 2 所示,按照均值口径计算的指数在 1990 年代初期接近 4,按照中位数口径计算的指数则超过了 5,由于此时 $R_A - R_B$ 的符号为负,表明中国正面临严重的“未富先老”状况;此后,一致性指数一路下滑,表明中国的“未富先老”状况在持续改善,2010 年以后两个口径下的指数均降至 2 以下;2017 年开始,两个口径下的指数均降至 1 以下,表明从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的维度上看,中国正式从“未富先老”状态迈入了“老富基本协同”状态。在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历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替代《世界人口展望 2022》中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后,基本趋势几乎没有变化,两个口径下的指数仍然均从 2017 年开始降至 1 以下,表明中国开始走出“未富先老”状态。

图 2 两个口径下 1990~2021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致性指数的变化

Figure 2 The Index of Consistency between Population Age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1990-2021



关于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还经常使用老年抚养比来代表人口老龄化水平。以老年抚养比替代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作为人口老龄化水平代表性指标来分析中国的“未富先老”状况,仍然可以得出中国已经走出“未富先老”状态的结论。采用《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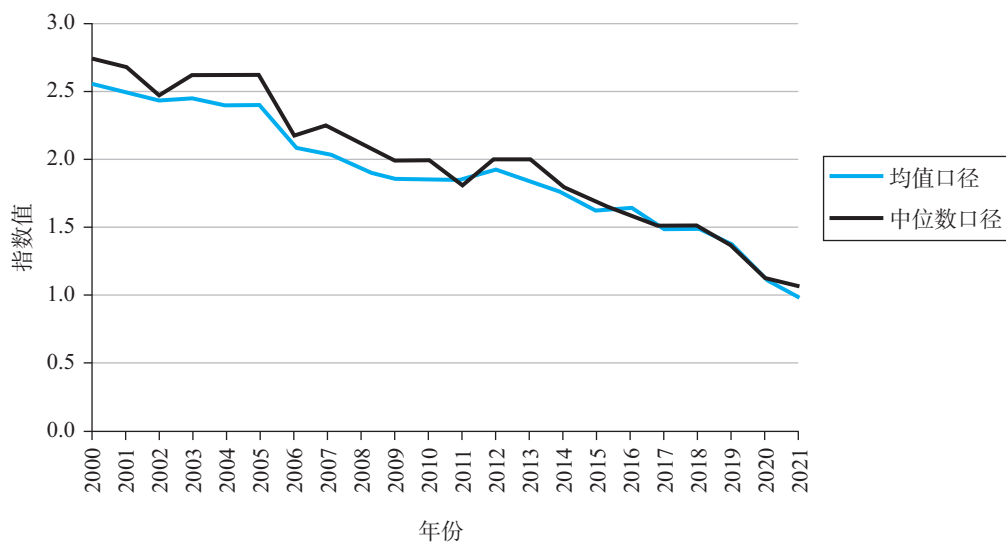
界人口展望 2022》中的中国历年老年抚养比数据进行分析时,一致性指数虽同样呈下降态势,但是在均值口径下,指数降至 1 以下的时间提前到 2016 年;在中位数口径下,指数则仍然从 2017 年开始降至 1 以下。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历年老年抚养比数据进行分析时,尽管在具体数值上略有变化,但两个口径下一致性指数降至 1 以下的时间均为 2017 年。

因此,无论是采用《世界人口展望 2022》还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数据,无论是采用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还是老年抚养比来代表人口老龄化水平,无论是采用均值口径还是中位数口径,当以人均国民收入代表“富”时,分析结果都显示,中国已经走出“未富先老”的状态,目前处于“老富基本协同”的阶段。

从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综合发展水平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在或即将走出“未富先老”状态。同样,我们首先以《世界人口展望 2022》中的各国(地区)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作为人口老龄化水平的代表性指标,以《人类发展报告 2021/2022》中的各国(地区)人类发展指数作为综合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分析结果同样显示,2000~2021 年期间,中国“未富先老”状况处于改善之中,无论是采用均值口径还是采用中位数口径计算,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综合发展水平的一致性指数均处于下降态势。具体来说,采用均值口径和中位数口径计算的一致性指数在 2000 年均处于 2.5~3.0 之间,随后持续下降;到 2021 年,按照均值口径计算的一致性指数降至略低于 1 的水平,按照中位数口径计算的一致性指数降至略高于 1 的水平,二者分别为 0.988 和 1.067,表明当前中国正处于从“未富先老”状态向“老富基本协同”状态过渡的关键时点(见图 3)。在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历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替代《世界人口展望 2022》中的相关数据后,按照均值口径和中位数口径计算的一致性指数均略大于 1,分别为 1.111 和 1.200,表明中国目前即将走出“未富先老”状态。显然,采用《世界人口展望 2022》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其原因在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世界人口展望 2022》的估计结果。

图 3 两个口径下 2000~2021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综合发展水平一致性指数的变化

Figure 3 The Index of Consistency between Population Ageing and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hina, 2000-2021



以老年抚养比作为人口老龄化水平的代表性指标进行分析时,趋势基本类似,但结论略有不同。在趋势上,两个口径下的一致性指数均表现为持续下降,表明中国“老”与“富”的关系持续改善。在是否走出“未富先老”状态的判断上,当采用《世界人口展望 2022》中的中国历年老年抚养比数据分析时,按照均值口径计算的一致性指数在 2020 年降至 1 以下,按照中位数口径计算的一致性指数则在 2021 年降至 1 以下;当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历年老年抚养比数据分析时,按照均值口径计算的一致性指数在 2021 年略高于 1,为 1.064,而按照中位数口径计算的一致性指数则刚好等于 1,表明中国正处于走出“未富先老”状态的临界点上。

综上所述,从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角度来看,可以明确判断中国已经走出“未富先老”状态。然而,从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综合发展水平关系的角度来看,基于不同来源、不同指标和不同口径数据所得的分析结果略有不同,有的表明中国刚刚走出“未富先老”状态,有的表明正在临界点上,有的表明即将走出这一状态。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中国正处于从“未富先老”状态向“老富基本协同”状态过渡的临界点附近,不同来源、不同指标和不同口径的差别可能导致不同的判断结果。这也是这一判断方法的局限性所在,即处于临界点时比较敏感,数据的变化会带来判断的差异。克服这一局限性的办法就是在位于临界点附近时,尽量不要根据单一数据而是要结合多方面数据做出综合判断。

概括起来,大体上可以判断,从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在 2017 年左右走出“未富先老”状态;从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综合发展水平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处于从“未富先老”状态向“老富基本协同”状态过渡的临界点,即便采用最保守的计算结果,一致性指数也已经接近 1,这意味着中国将很快走出“未富先老”状态。

4 结论与讨论

“未富先老”是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基本特征的经典判断,其影响甚大。但是自这一判断提出以来,一直面临争议。回顾这些争论能够发现,学者们对“未富先老”的内涵以及判断标准尚未形成共识,所以很多争论实际上并不在同一个逻辑下展开。本文在系统回顾“未富先老”判断产生以来的各种争论以及总结“未富先老”的不同内涵和判断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以“老”与“富”排序关系的世界平均水平为参照的更为直观的判断标准。以此标准可以把世界各国(地区)分为 3 种类型:未富先老、老富基本协同、富先于老。依据这个标准来判断 1990 年以来中国“老”与“富”的关系,能够发现中国在 1990 年代就一直处于“未富先老”状态,但近年来这种状况正在改善。以人均国民收入代表“富”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在近些年刚刚走出“未富先老”状态,进入“老富基本协同”状态;以人类发展指数代表“富”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正处于从“未富先老”状态向“老富基本协同”状态过渡的临界点。在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走出“未富先老”状态表明中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世界各国(地区)的排序中,中国发展水平的相对位置实现了比人口老龄化水平相对位置更快的提升。

在中国走出“未富先老”状态的关键时刻,当我们重新审视“未富先老”这一判断时,能够更好地认识其重要意义。考虑到这一判断提出的时间是 20 世纪 80 年代,而彼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刚刚开始被人们认识到,这一判断的提出体现了敏锐的判断力和前瞻性,其在引

起全社会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本研究限于数据没有对1980年代中国“老”与“富”的关系进行考察,但从1990年代“未富先老”状况的变化趋势来看,1980年代中国的“未富先老”状况更为严重,因而在当时提出这一判断不仅是准确的,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随着中国即将走出“未富先老”状态,一些学者提出对这一判断的替代性表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未备先老”和“边富边老”。“未备先老”对于提示中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准备有所不足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实际上已经跳出了“老”与“富”的关系,是一个新的视角,不能替代“未富先老”判断所代表的研究视角。“边富边老”从字面上更容易被理解为是一种伴随现象,即在变老的同时也在变富,并未包含对二者是否协调的判断。同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地区)均处在一边变富一边变老的过程中,因而这一表述也不大适用于形容“老”与“富”关系的特征。本文采用了“老富基本协同”的表述,主要是考虑到要延续“未富先老”表述中所包含的对“老”与“富”关系的判断。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关于中国正在走出“未富先老”状态的判断,是在与世界各国(地区)相比较的基础上做出的,只是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发展水平(经济或综合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已经或即将处于世界平均差距水平之下,可以认为是一个基本正常的状态,但并不代表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已经与发展水平完全协调,更不代表二者之间完全没有差距。实际上,从前文的分析可知,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在世界各国(地区)中的排序依然高于发展水平的排序。更进一步说,即便中国进入 $I_{A,E} \leq 1$ 的“老富基本协同”阶段, $R_A - R_E$ 的符号仍然为负,考虑到中国未来迅猛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如果发展水平不能保持快速上升势头,中国仍将有可能回到“未富先老”状态。

进入“老富基本协同”阶段后,仍然要高度重视应对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即便在总体上进入了“老富基本协同”阶段,中国还面临着各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背离的问题,还存在着局部地区“未富先老”的问题(林宝,2021),还面临着城乡差异导致的农村地区“未富先老”的问题。邬沧萍等(2007)曾提出,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是衡量“未富先老”状况变化的标尺。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对人口老龄化仍然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只有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持续改善“老”与“富”的关系。当前,我国正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要通过国家战略的实施,统筹各项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努力解决现阶段面临的各种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创造有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人口条件。同时,要形成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的转变、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效率提升(林宝,2021)。

中国“老”与“富”关系的转变刚好发生在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关键时刻,这要求我们将“老”与“富”关系的转变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时代背景。一方面,“老”与“富”关系的转变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老”与“富”关系的转变,人们对共享发展成果有更高的要求,会更加关注公平问题。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及时完善各项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尽量做到有备而老。特别是应抓紧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要求,增强发展的均衡性,不断缩小地区、城乡和人群差异,

在总体上走出“未富先老”状态的同时不断减少局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未富先老”现象。另一方面,“老”与“富”关系的转变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利条件。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激发国内消费潜力。“老”与“富”关系的转变表明中国有更强的能力和更好的条件开发利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可以在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基础上发挥老年人口巨大的消费潜力,推动银发经济发展,使之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推动力量。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杜鹏,杨慧.“未富先老”是现阶段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人口研究,2006;6:28-36
Du Peng and Yang Hui. 2006.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is the Feature of Current China’s Population Ageing. Population Research 6:28-36.
- 2 顾严.中国还是“未富先老”吗?——基于“老”-“富”关系模式的判断.社会政策研究,2019;1:11-24
Gu Yan. 2019. Is China Still at the Status of “Grow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A Study Based on Typ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Policy Research 1:11-24.
- 3 李建民.中国真的“未富先老”了吗? 人口研究,2006;6:23-28
Li Jianmin. 2006. Does China Really Get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Population Research 6:23-28.
- 4 李建民.“未富先老”? 还是“未备先老”? 人口研究,2007;4:52-56
Li Jianmin. 2007.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or “Getting Old before Preparation”? Population Research 4:52-56.
- 5 林宝.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60
Lin Bao. 2014. Population Ageing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Urban Basic Old-age Insuranc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60.
- 6 林宝.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内涵、目标和任务.中国人口科学,2021;3:42-55+127
Lin Bao. 2021. Actively Addressing Population Ageing: Connotation, Targets, and Task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3:42-55+127.
- 7 马瀛通.加速人口老龄化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国人口科学,1987;2:41-49
Ma Yingtong. 1987. Accelerating Population Ageing and Promo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41-49.
- 8 马瀛通.人口红利与日俱增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中国人口科学,2007;1:2-9+95
Ma Yingtong. 2007. The Increasing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 Driving Force of China’s Leaping Development in the 21th Century.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1:2-9+95.
- 9 莫龙.198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定量研究.人口研究,2009;3:10-19
Mo Long. 2009. Quantitative Study o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China’s Population Age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1980 to 2050. Population Research 3:10-19.
- 10 乔晓春.对《加速人口老龄化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一文的几点看法.中国人口科学,1988;2:39-41+34
Qiao Xiaochun. 1988. Some Opinions on the Paper “Accelerating Population Ageing and Promo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39-41+34.
- 11 王丰.人口红利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吗? 人口研究,2007;6:76-83
Wang Feng. 2007.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Really Inexhaustible? Population Research 6:76-83.
- 12 邬沧萍,曲海波.面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应做的准备.老年学杂志,1986;4:1-3
Wu Cangping and Qu Haibo. 1986. Preparation for the Challenge of Population Ageing. Journal of Ger-

- ontology 4:1-3.
- 13 邬沧萍. 社会老年学.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204-205
Wu Cangping. 1999. *Social Gerontology*.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4-205.
 - 14 邬沧萍, 陈卫.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与特点. 南方人口, 1990; 2: 8-13
Wu Cangping and Chen Wei. 1990. The Tran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Southern Population* 2: 8-13.
 - 15 邬沧萍, 何玲, 孙慧峰. “未富先老”命题提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口研究, 2007; 4: 46-52
Wu Cangping, He Ling, and Sun Huifeng. 2007. The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roposition of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Population Research* 4: 46-52.
 - 16 邬沧萍, 孙娟娟. 未富先老——我国人口的新课题. 群言, 2002; 9: 18-20
Wu Cangping and Sun Juanjuan. 2002.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The New Subject of China's Population. *Popular Tribune* 9: 18-20.
 - 17 邬沧萍, 王琳, 苗瑞凤. 中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前景和对策. 人口研究, 2004; 1: 8-15
Wu Cangping, Wang Lin, and Miao Ruifeng. 2004. The Process, Prospec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opulation Age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pulation Research* 1: 8-15.
 - 18 邬沧萍, 徐勤. 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战略的新思考. 老年学杂志, 1990; 3: 129-131
Wu Cangping and Xu Qin. 1990. New Thinking on China's Ageing Population Strategy. *Journal of Gerontology* 3: 129-131.
 - 19 邬沧萍. 重新审视中国人口“未富先老”的命题. *China Population Today*, 2008; 1: 29
Wu Cangping. 2008. Rethinking the Proposition of “Gett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in China's Population. *China Population Today* 1: 29.
 - 20 姚从容, 李建民.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 国际比较及其启示. 人口与发展, 2008; 2: 80-87
Yao Congrong and Li Jianmin. 2008. Population Age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Implication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 80-87.
 - 21 United Nations. 2022.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Online Edition. <https://population.un.org/wpp/>.
 - 22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22.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22: Uncertain Times, Unsettled Lives: Shaping Our Future in a Transforming World*. <https://hdr.undp.org/content/human-development-report-2021-22>.

(责任编辑: 陈佳鞠 收稿时间: 2022-12)